

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與營運— 以《山范交接檔案》為中心

林慶弧

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與營運—

以《山范交接檔案》為中心

林慶弧

摘要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作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唯一成立的府立圖書館，自大正3年（1914）4月13日臺灣總督府以第62號敕令設置，至1945年5月建築物被炸毀止，該館經營三十年，是一所人力資源充足、經費資金充裕、館藏資源豐富，逐漸發展成為臺灣最具規模的圖書館，亦肩負了輔導臺灣各地圖書館的任務，可謂是臺灣圖書館的中樞。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該館第五任館長山中樵，對於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圖書制定疏散計畫，將約十六萬冊圖書疏散於臺北四處郊區，1945年的美軍轟炸行動中，總督府圖書館被燒夷彈擊中，整棟建築物全毀，所幸圖書疏散得宜獲得保存。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圖書館進入山中樵館長看守時期。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派范壽康接收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經過數次更名，全稱為「臺灣省立圖書館」，直屬臺灣省行政長官；民國36年二二八事件後，再改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館名確定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

本文擬以戰後初期「臺灣省立圖書館」為中心，根據當時的官方公文、政府公報、統計要覽，以及報章雜誌與回憶錄等資料，尤其是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山范交接檔案》，深入觀察當時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決策制定、接收工作開展，以及之後的營運模式，剖析該館在戰後初期接收與改制過程中的角色、地位及影響，藉期瞭解臺灣省立圖書館在時代變局與政權轉換過程中的經歷、遭遇與處境。

研究發現圖書館發展的方向與營運目的，均以當時的政府政策作為指導原則，是貫徹政府政策的重要公部門，深受政策支配與影響，戰後初期的圖書館受到政府管制與影響十分明顯，政治取向濃厚，但該館所從事的各種努力與貢獻，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背景下，仍營運出值得稱許的專業水準。

關鍵字：臺灣圖書館史、臺灣省立圖書館、省立臺北圖書館、山范交接

檔案、戰後

Key-word：History of Taiwan Library, Taiwan Provincial Library,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Library, San-Fan Transfer File, Post-War

一、前言

今日臺灣民眾習以為常的圖書館，是日治時期引進的西方新式機構，臺灣圖書館事業的起源，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初期，民間倡議設置私立圖書館，由一群對文化有理想的社會人士，共同努力所累積的成果。爾後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設立和營運，不但是臺灣教育與文化史的重大事件，也是近百年臺灣圖書館發展事業的重要課題，圖書館功能的研究，一般皆以「社會教育」的範疇來定義，但是圖書館的經營卻是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尤其是在兩個不同政權的交接時代，更能觀察不同的發展面貌。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接收政策以「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為主軸，由「皇民化」轉變到「祖國化」（黃英哲，2007，頁 10-11），公共圖書館承擔了此項社教的任務。對於相隔五十年分治的狀況下，如何制定接收政策與執行重建復員的工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經濟發展與社會條件下，對於臺灣圖書館事業造成哪些層面的影響？圖書館由日治時期的經營轉換成為不同體制下的經營模式，對於各項作業能否順利移轉？抑或因為其他各項時代背景而產生重大的轉折，值得深入探究。

圖書館作為文化事業的表徵，其盛衰與走向常能反映一國政治、經濟情況，與社會文化水準，是評估該國文明開化的重要指標。日本殖民政府設置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前人對於該館的研究，有張圍東（2005）的《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探討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沿革與發展、經營與服務，指陳總督府圖書館館藏臺灣史料之學術研究價值，及其在公共圖書館之地位與影響，和社會教育之重要性。郭冠霖（2001）以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為研究主體，發現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並無明文條列之館藏政策，從該館目錄進行館藏數量與種類分析，提出該館的館藏發展政策大綱，受到當時日本政府政策影響深遠，完全配合日本政府治臺方向，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為重要的社會教育實施機構。以及林慶弧（2016）所撰寫的〈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唯上述三篇皆未論及戰後的接收與營運。

現在的國立臺灣圖書館則是日治時期的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戰後館名不斷更迭，亦改隸不同單位，廖又生（2005）的《臺灣圖書館經營史略》，對該館的十六位館長的生平及治館理念的考證及介紹，析述臺灣僅存的最古老公共圖書館在各不同階段歷程，並從中梳理本土圖書館事業發展之梗概，可作為更張始末的發展資料運用。

然而，對於戰後初期的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因為戰爭的破壞，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加上社會環境因素，該館如何接收與營運，迄今仍無專門論述，該館在民國 34~38 年間的營運成效如何，無法有全盤式的瞭解與分析，職是之故，本文擬以戰後的圖書館制度興革，運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以下簡稱《長官公署公報》）、《臺灣省政府公報》，以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以下簡稱《長官公署檔案》）等，其中尤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山范交接檔案》的內容，最為直接的接收歷程與貼近史實。

透過上述各種史料的分析整理，耙梳進行交叉比對，架構此一中心論述，以歷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結果，釐清臺灣省立圖書館接收原總督府圖書館後，針對戰後初期提供何種運作與服務，以及在當時戰後社會不安、經濟困頓的情形下，所從事的各種努力與貢獻，進行詳細的探討。

二、接收過程

戰後初期對臺灣而言，所經歷的文化變遷，是臺灣文化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段歷史經驗（黃俊傑，2006，頁 17）。這個大變動的時代，適值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殖民結束，國民政府即將統治臺灣，此二套完全不同的政體，如何交替與變革的歷程，是臺灣近代史上，至為關鍵的政權轉移、政制變革與制度的交接。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著眼於接收改制後，如何將臺灣從日本的殖民地，變成中華民國的一省，是這個階段文化政策的重點（楊聰榮，1992，頁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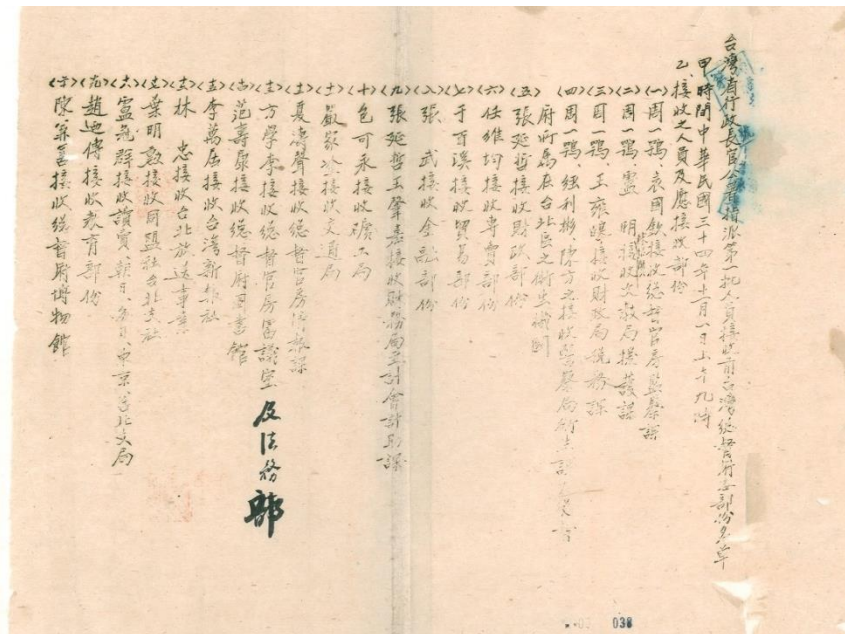
實際上，黃英哲（2007，頁 87）認為陳儀對於接收臺灣後的文化事業是有願景的，從其寫給許壽裳¹邀請擔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的信件中，陳儀表述個人未來的文化建設宏圖，計畫將毀於空襲，但規模宏大、壯觀雄偉的臺灣總督府修護後，「為留紀念計，擬以三年功夫，把他修復起來，作為臺灣文化館，其中包含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體育館，而編譯館亦在其內，合為五館。」要將原來殖民地權力象徵的臺灣總督府，解構其政治圖騰的建築意義，改造成為臺灣的「文化中心」，可惜後來這個計畫並未實現（范壽康，1946，頁 647）。

陳儀於民國 34 年 10 月 24 日抵臺，10 月 25 日中國戰區臺灣地區受降式於上午十點於臺北公會堂舉行。接收工作自同年 11 月開始，12 月底除軍事外，各單位悉數接收完畢，圖書館部分總計接收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與八十六所地方圖書館。至翌年，民國 35 年 4 月完成全部的手續，前後僅半年時間即告完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

民國 34 年 10 月 21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秘書處（1945）以秘接箋字第三號函，通知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代理部長

¹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或季蕐），浙江紹興人。1902 年赴日本留學，結識同是浙江官費留學的同鄉魯迅和陳儀。1904 年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史地科就讀。1909 年返國從事教育工作，歷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長、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職。34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壽裳擔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旋應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之邀，前往臺灣擔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二二八事件後，因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改組，陳儀離職，臺灣省編譯館撤廢，許壽裳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隔年二月十八日於臺灣大學教員宿舍遇害。見黃英哲，〈許壽裳介紹〉，收入黃英哲主編《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頁 ii。

須田一二三，該署將於 11 月 1 日指派第一批人員前往接收原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各部，並附上接收人員名單，共計有三十二個一級單位，派二十八位接收人員，而負責接收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是范壽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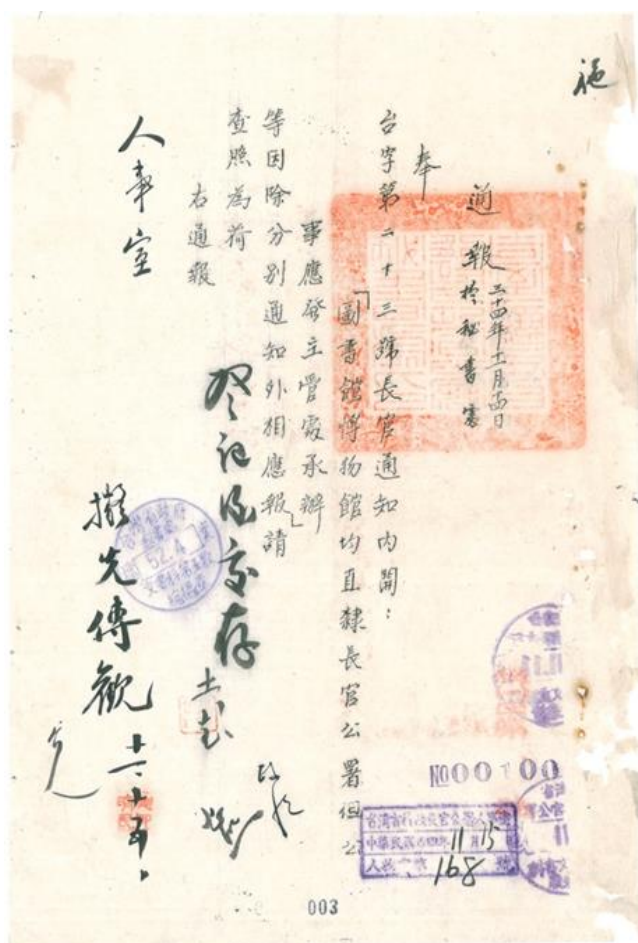
照片 1 行政長官公署第一批接收人員名單

資料來源：〈長官公署箋函秘接箋字第三號函〉，收入《中央宣傳部接管臺灣文化宣傳事業計畫綱要電送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0326600003037，掃描號 4522003440。

至於接收之後的原總督府圖書館，其組織位階與館名的訂定，並非接收前就已決定，而是直到 11 月 14 日才終於拍板定案，陳儀決定「圖書館、博物館均直隸長官公署，但公事應發主管處承辦」（長官公署，1945），亦即圖書館屬於一級單位，直接隸屬臺灣省行政長官，與教育處平行，該單位的預算獨立。館名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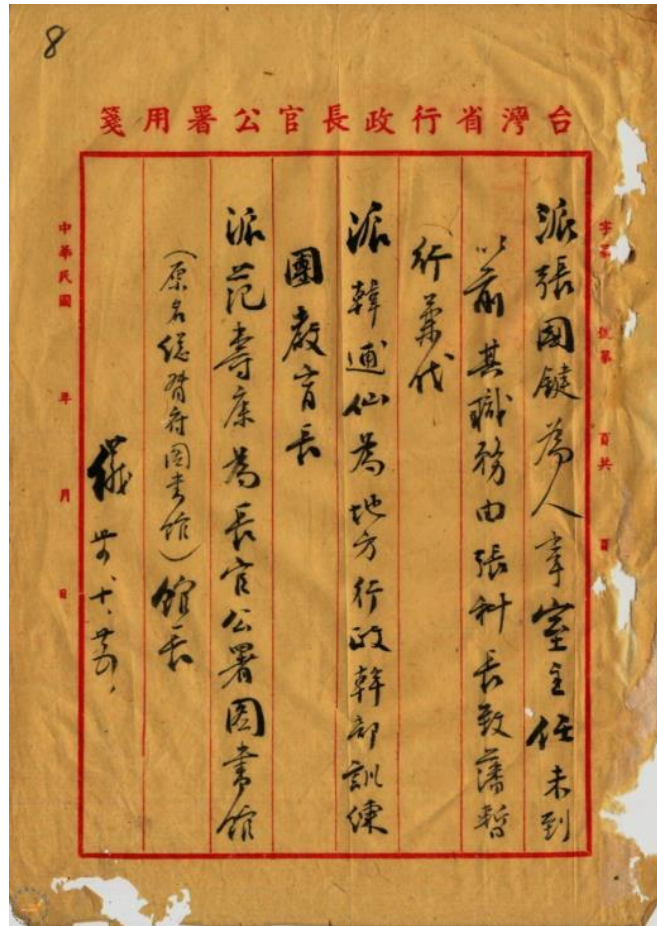
²范壽康（1896-1983），字允臧，浙江紹興人，留學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專攻教育哲學，回國後，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編輯，主編《教育大詞典》。後擔任大學教職，抗日戰爭期間，出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副廳長兼第七處處長，協助郭沫若領導抗日宣傳和統戰工作，後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國際研究室主任。34 年末參加國民政府的陳儀行政團隊，任參議，到臺灣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35 年 1 月 16 日原教育處處長趙迺傳辭職，陳儀派他代理教育處處長，同年 1 月 19 日真除教育處處長，仍兼行政臺灣省臺灣省長官公署圖書館館長，36 年 5 月，陳儀去職，范壽康轉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10 月 13 日起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38 年 1 月 20 日傅斯年校長上任後，改聘蘇薌雨任圖書館館長，范壽康從此卸下行政職務，專任臺大哲學系教授。64 年退休後借道美國回中國定居，曾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72 年病逝北京。見薛化元，〈范壽康〉，收入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頁 612。

分，則直到民國 35 年 6 月 10 日才正式定案，館名正式全稱為「臺灣省立圖書館」（長官公署，1946）。其間曾經有因其直屬長官公署，亦稱為「長官公署圖書館」者（長官公署，1946），或因時間匆促制定規程，也曾定名為「臺灣省圖書館」者（長官公署，1946）。在短期內反覆變更機關名稱，表示對該機關的屬性與地位，未深思熟慮，也未確定日後的發展方向，從其三個月內前後公布二次的〈規程〉與〈章程〉，可探知長官公署對於圖書館態度的猶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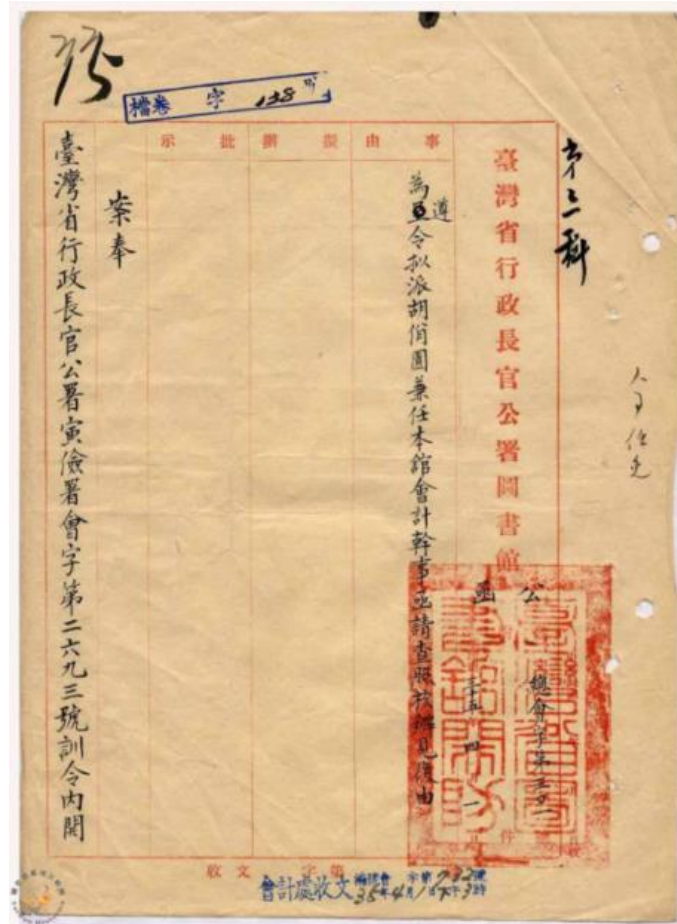
照片 2 圖書館、博物館隸屬公署通報

資料來源：〈秘書室通報 34 年 11 月 14 日〉，收入《圖書館博物館隸屬公署通報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0301200012003，掃描檔 461400340004。



照片 3 派范壽康為長官公署圖書館館長令

資料來源：〈派范壽康為長官公署圖書館館長令〉，收入《范壽康派任圖書館館長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0303230006073，掃描檔 059700350032。



照片 4 印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全銜的公文紙

資料來源：〈教育處會計人員任免〉，收入《人事任免會計人員教育類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0303232054001，掃描檔 127500350038。

即使是正式接收後，仍有許多外力介入，接收的過程出現無法預料的變數。原總督府內仍有典藏圖書資料，理應全部移交給新設立的臺灣省立圖書館統一整理、分編後進行利用，然而長官公署經濟委員會（1945）認為該批數量多達 42,030 冊的圖書檔案，非常珍貴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於是請示陳儀能否將該批圖書資料撥交給經濟委員會，兩個單位進行爭奪圖書資料的公文往返，民國 35 年 3 月陳儀最後裁定交給經濟委員會，臺灣省立圖書館喪失保存該批寶貴機料的機會。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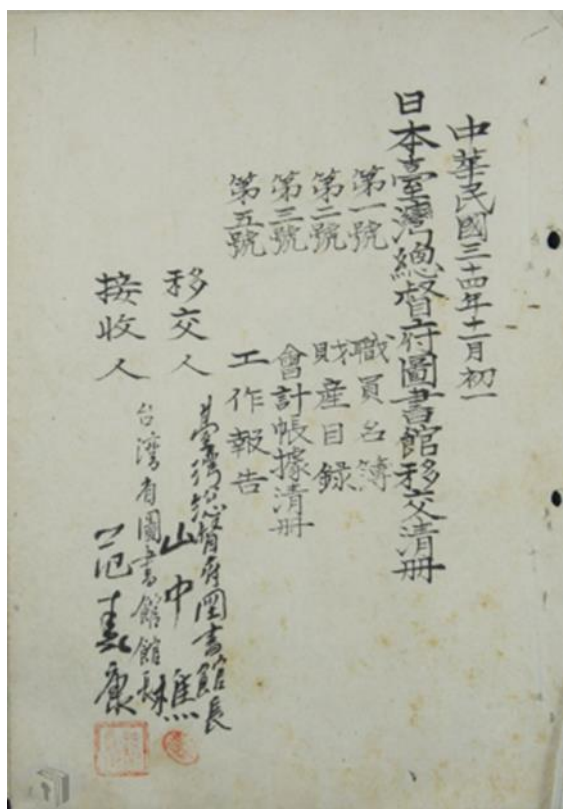
由於戰後政局紛擾，中央各部會亦各自派員到臺灣，進行相關業務的接收事宜，但令出多門，難以適從，民國 35 年 3 月就發生一件為了圖書文物的接收，導致各單位間的職權混亂。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1946）屬於中國國

³該批資料分別是圖書 24,930 冊、圖表 2,610 組，與地圖 14,490 幅。

民黨的直屬管轄體系，對於文化與思想的工作均直接受命於黨中央，民國 35 年 3 月宣傳委員會收到一份由上級交辦的業務，略謂「收復區的敵偽大學與文化機關等設備，應交由各區敵偽產業處理局轉交教育部特派員保管運用，其中圖書與文物接收，得交由所在地駐軍、或其他機關及地方政府自行接收。」準此，圖書館亦屬於文化機關之一，應如何進行後續接收事宜，應全數交給教育部接管，或繼續由長官公署承接。臺灣省立圖書館請示長官公署，長官公署又透過宣傳委員會呈請上級解釋，公文往返數月之久，最後還是交由長官公署自行決定。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該館第五任館長山中樵對於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圖書懷有高度的熱忱與關愛，不願見到這些費盡千辛萬苦蒐集來的圖書資料，受到無情的戰火波及，於是著手制定圖書疏散計畫，戰時所有物資皆嚴格管制，尤其是軍需用品的汽油，只好使用牛車替代汽車運送，將約十六萬冊圖書疏散於臺北四處郊區，每天牛車絡繹於途，堪稱流離失所的際遇。幸好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事先疏散得宜，1945 年 5 月的美軍轟炸行動中，總督府圖書館被燒夷彈擊中，整棟建築物全毀（山范交接檔案，1945，頁 2），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圖書館進入山中樵館長看守時期。

民國 34 年 11 月 1 日上午九點，范壽康與山中樵（長官公署，1945）在原總督府博物館一樓臨時圖書館辦公室，辦理原總督府圖書館接收事宜，此時山中氏已備妥該館的文件、財產及事業等項的移交清冊，共有五號，第一號關於職員名簿；第二號財產目錄；第三號會計帳據清冊；第四號公用財產目錄；第五號工作報告。



照片 5 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

資料來源：《山范交接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號 104.01/1/1/1-2，掃描號 0034-104.01-0002。

由於原總督府圖書館的建築已蕩然無存，圖書以外的財產，能夠移交的種類與數量非常有限，登記在移交清冊上的內容，事務用品僅有 2 座小書架、6 張桌子、11 張椅子、2 架日文打字機、1 個硯臺、2 個水盆、2 隻算盤、1 個手提金庫、7 個大皮箱、1 個小皮箱、1 個謄寫版、1 個時鐘、1 個藥罐、1 幅掛表；書庫用品則有分類標示版 100 個、書庫用書架 38 座、新聞閱覽桌 7 張（長官公署，1945）。另有該年度尚未使用的現金 16,880 円，其中 9,473 円是僱員未來到隔年三月份的薪津與獎勵金（塩見俊二，2001，頁 48），經常門的費用僅剩下 7,407 円，僅有這些少量的辦公用品與經費，如何維持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正常運作，實在是非常困難的現實條件。

最艱難之處在於沒有館舍可以利用，暫借博物館的一樓空間，辦公已顯侷促，更何況要開放閱覽服務，更不可能將疏散四個處所的圖書資料運回妥善復員處理。

三、館藏圖書接收

由於戰爭緣故，山中氏已將原總督府圖書館的十六萬餘冊圖書疏散到郊區四個安全處所，尚未全部運回，因此館藏部分並未實際加以清點，僅以「和漢書、洋書 160,000 冊」約略數據作為移交的總冊數（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財產目錄，1945），分析該移交清冊，可以發現該館在未遭受轟炸前，和漢書達 187,359 冊，洋書有 12,708 冊，總計 200,067 冊，無奈在轟炸過程中，巡回書庫、兒童圖書、裝訂中或修復中圖書雜誌、外借的圖書，共約四萬五千冊在大火中燒毀，因此移交冊數為十六萬冊（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財產目錄，1945，頁 3）。

這批為數約十六萬冊的圖書，雖無移交明細，但參考移交清冊所附 1943 年（昭和 18）的圖書分類統計（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1945，別紙第一號），可以推估當時的各不同類號的圖書分類總冊數（如表 1）。

表 1 原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圖書分類（1943 年度）

	和漢書	洋書	小計	佔總冊 數比例
0 門 總類	48,501	2,796	51,297	26%
1 門 哲學宗教	13,508	544	14,052	7%
2 門 教育	6,342	516	6,858	3%
3 門 文學語學	30,246	1,533	31,779	17%
4 門 歷史地誌	30,691	1,914	32,605	17%
5 門 法律經濟 社會	23,595	2,863	26,458	14%
6 門 理學醫學	8,377	1,038	9,145	4%
7 門 工學軍事	5,059	443	5,502	2%
8 門 藝術	7,079	212	7,291	3%
9 門 產業家政	13,961	849	14,810	7%
小計	187,359	12,708	200,067	10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山范交接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號 104.01/1/1/1-2，掃描號 0034-104.01-0017 整理。

又由圖 1 更能清楚了解接收初期的圖書分布情形，其中以總類最多，約佔 26% ，文學語學類和歷史地誌類，此二類圖書冊數處在伯仲間各佔 17% ，緊接為法律經濟社會類，約佔 14% ，而數量最少的是工學軍事類，僅有 2% 。

實際上這批資料的重要性立即顯現，民國 36 年年初外交部（1947）欲查詢西沙群島的相關資料，外交部以為向管轄西沙群島領土的廣東省政府索取，就能獲致滿意的資料檔案，結果廣東省政府沒有任何西沙群島的資料，轉求助於長官公署洽商代為查詢，長官公署下達指令要臺灣省立圖書館查詢西沙群島相關館藏資料，該館不但館藏豐碩，還立即編印一本《西沙群島政治經濟史地資料目錄》，結果又因為複製翻印產生大筆經費，不知應向哪個單位索取經費的事件（行政長官公署，1947）。該事件突顯臺灣省立圖書館的館藏豐富，且證明服務人員的專業檢索能力與行政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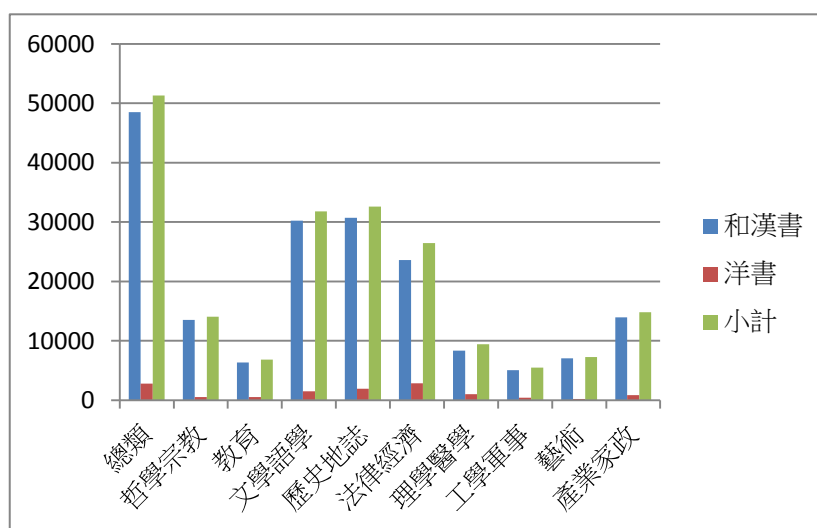


圖 1 原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圖書分類（1943 年度）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山范交接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號 104.01/1/1/1-2，掃描號 0034-104.01-0017 整理。

四、館員接收與留用

長官公署考量日人大量遣返後，其所遺留之工作勢必遭逢接替無人的窘境，再加上中國大陸正值復員之際，人力、物力甚感缺乏，為清理業務、維

持各單位事業運作及特殊需要等，在必需的專業人員補充之前，不得不留用部分日籍人員，以協助臺灣之接收與復員（長官公署秘書室，1946，頁 197）。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在經營和技術管理方面，以日本人為主體，臺灣籍員工多擔任事務性工作，鮮有機會在管理和技術職缺獲得任用。根據〈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1946），臺灣省立圖書館於戰後初期留用日籍館員，從移交清冊的職員名簿上，計為原館長山中樵、司書三人市村榮、西宮正義和百濟孝四郎；書記劉金狗、雇員有五人佐藤貴市、高碧烈、陳錫金、龜井冷子、江枝明；臨時雇員平島豐次郎、守衛仲本顯德、游景木二人，和職工陳蚶目、臨時傭呂傳平。其中日籍館員有 8 人，除佐藤貴市與龜井冷子二人未留用外，其餘日籍館員皆被留用，繼續辦理復員館務。剛接收後的圖書館館員數為十五人，計有館長范壽康、助理編輯劉金殼（即劉金狗）、雇員高碧烈、陳錫金與江枝明，傭工四人，另有續聘的游景木、陳蚶目和呂傳平，與新聘的李玉（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臺灣省圖書館 35 年 1 月份職員薪津名冊，1946）。

為維持圖書館服務讀者與復員整理於不輟，而留用日籍館員為主力，連新上任的范壽康館長亦經常借重日籍館員的長才，尤其是前任館長山中樵成為諮詢顧問，並委以洽購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個人圖書的任務，在館內、外事務上皆甚獲重視，在戰後初期圖書館的接收、轉型上，實具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廖又生，2005，頁 78-79）。

就在范壽康接收臺灣省立圖書館（1945）的同時，實際上也一併接收「南方資料館」，從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的《山范交接檔案》檔案內，收錄的〈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臺灣省圖書館 34 年 11 月份職員薪津名冊〉（1945）分析，34 年 11 月支領薪水的館員數量，除原總督府圖書館的人員外，還增加素木得一、樋口末廣、江崎光夫、柳沼金治、松本喜宇悅、松山鶴、林幸子、竹下律子、高木正子，共九人名單，職稱則為「研究員兼調查組長」、「調查員」、「技術員」、「事務員」，與圖書館的原有職稱「助理編輯」與「雇員」不同，研判證實民國 34 年 11 月即已合併「南方資料室」，而非「國立臺灣圖書館」（2018）館史沿革中所稱民國 35 年才併入。⁴

⁴關於這段接收歷史，可參考數度更改館名的國立臺灣圖書館官方網頁，內容簡短，謂「二次戰後，民國三十四年十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次年並將日人『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合併，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圖書館』（簡稱為臺灣省圖書館）。」詳見國立臺灣圖書館/首頁/關於本館/歷史沿革（檢索日期 2018 年 8 月 1 日）。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臺灣省立圖書館徵用日人薪資名冊

職別	姓名	生	津貼	借支	名冊	徵用日人部
研究員	秦木得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蓋章備註
研究員	山中樵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研究員	樋口末廣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研究員	市村榮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研究員	江崎光夫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研究員	西宮正義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研究員	百崎孝四郎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研究員	柳沼金治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研究員	松本喜守悅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研究員	松山鶴	四五	四五	四五	四五	
研究員	平島豐次郎	三〇	三〇	三〇	三〇	

照片 6 民國 34 年 11 月臺灣省立圖書館徵用日人薪資名冊

資料來源：〈日本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移交清冊-臺灣省圖書館 35 年 1 月份職員薪津名冊〉，收入《山范交接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號 104.01/1/1/1-2，掃描號 0034-104.01-01-0040 至 0034-104.01-01-0041。

這批日本籍高級技術與學術人員，在人員遞補之前，仍協助臺灣的復員工作，等待接替人員補充，即予以遣返，迨至 36 年 2 月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決定提前遣返所有在臺留用日人，該館所有日籍館員，全數皆被遣送返回日本。

范壽康在民國34年11月接任臺灣省立圖書館館長，後又負責接收「臺灣印刷株式會社」；隔年1月份，原教育處處長趙迺傳辭職返回中國，陳儀派范壽康代理教育處處長職務（長官公署，1946），仍兼任臺灣省立圖書館館長，此後范壽康的工作重點以教育處為主，期間，35年4月先兼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籌備處」主任，8月兼「學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9月兼「臺灣省公民訓練團」委員，與10月兼「臺灣省臺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長官公署，1946），可說是身兼多職，職務繁忙無法兼顧圖書館館務工作，大部份圖書館業務委由山中樵處理，從山中氏於民國35年11月仍可具名開發員工離職證明（山中樵，1946），可應證上述說法，范氏對於臺灣省立圖書館復員與營運並無全心投入。張園東（1998，頁80）認為當時臺灣省立圖書館留用的日籍館員，其服務精神和專業能力備受服務單位肯定，對戰後初

期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接收與復員，實具有一定的付出與貢獻。



照片7 民國35年11月中樵開具的離職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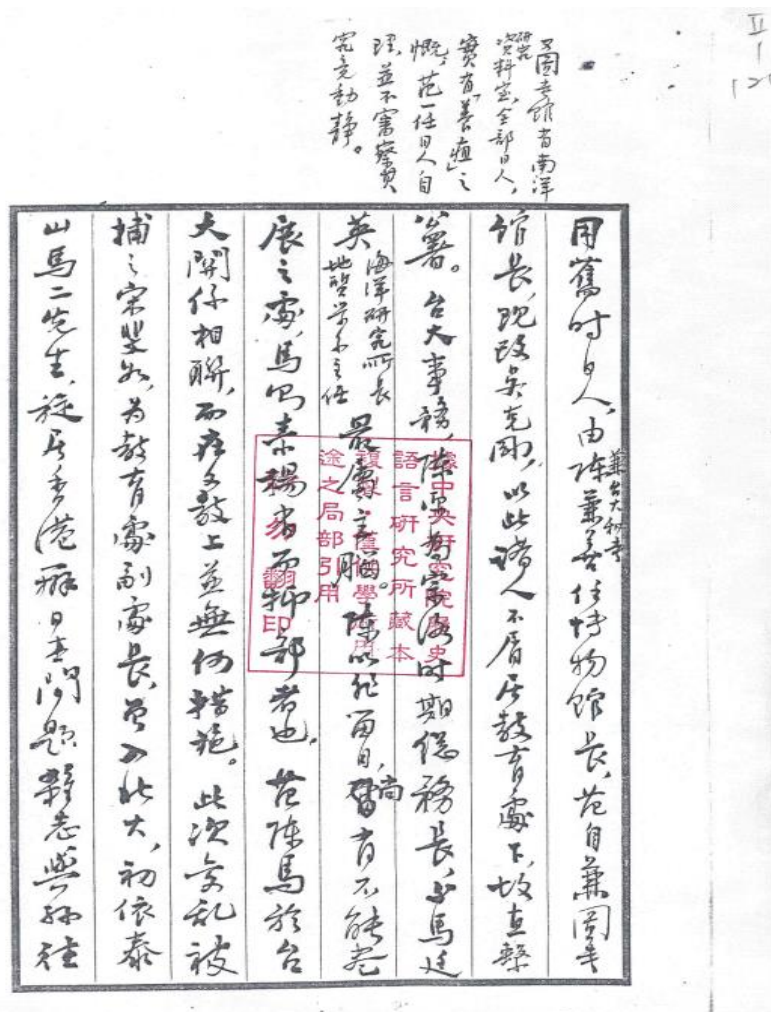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圖證第六號證明書〉，收入《山范交接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號104.01/1/1/1-2，掃描號0034-104.01-0048。

然而另一批原為南方資料館的日籍館員績效如何，從當年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兼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魏建功（1947），⁵離開臺灣返中國後，寫信給剛上任的臺大校長傅斯年⁶，從信件的字裡行間中，可以看出端倪。

……弟以亟須買舟，匆匆來滬，未及奉辭，至乞恕其脫略！到滬以後，聞諸開明書店友人，似范壽康在教育方面有繼續可能。疑此當是白健生在臺有所洽定布置。范為人尚好，惟遇事並無主見，更缺遠慮。其淵源係沈仲九關係。過去臺大，范即代表省方參加校務，羅宗洛君先被擺布，陸志鴻近復遭厭棄。教育處中無得力幹才，憤憤自用者多。省方又有博物館、圖書館、編譯館，皆以人事關係，不屬教育處。編譯館新設，許季第先生長之，皆新延人士。博物、圖書兩館則留用舊時日人，由陳兼善任博物館長，范自兼圖書館長，現改吳克剛，以此諸人不屑居教育處下，故直繫公署。又，圖書館有南洋研究資料室，全部日人，實有「養疽」之慨；范一任日人自理，並不審查其究竟動靜。……

⁵魏建功（1901-1980），字益三、號天行，江蘇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中法大學、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校。34年末應陳儀之邀到臺灣，任臺灣省行政臺灣省長官公署參議兼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36年兼任臺大中文學系教授。37年6月離開臺灣回中國。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人物/魏建功，《國家文化資料庫》。

⁶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北京大學畢業後，至英國與德國留學。回國後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並負責創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38年1月20日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38年4月6日臺灣大學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氏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臺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政府官員交涉，要求逮捕臺灣大學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39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見任育德，〈傅斯年〉，收入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頁871。



照片 8 魏建功寫給傅斯年的信件原稿

資料來源：1947 年 4 月 1 日，〈魏建功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II-120。原檔案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

針對魏建功對南方資料館工作人員的意見，作者持不同的意見與看法，認為或許是魏氏不了解該館的真實情形，原合併前的南方資料館館長素木得一，是知名的昆蟲學家，曾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第一屆農學部部長，而南方資料館是一個純學術研究機構，該館的性質為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進行各種的研究，該館擁有館藏八萬餘冊，都是研究南洋與南中國的圖書資料，以語文別區分，荷蘭文圖書最多，法文與英文圖書次之，第三為德文書籍，中文與日文書最少，提供研究成果給日本政府作為參考（范壽康，1946，頁646）。

最特別的是，在沒有電腦可以從事自動化檢索前，該館對於館藏的檢索，已經仔細分析到以圖書內容的「篇」或「節」做為檢索的條目，也對每一篇的期刊論文則給予不同「標題」，例如要查詢有關「鯨」或「石炭」的相關資料，只要從索引詞條，便能將該館所有圖書與期刊中，將「鯨」或「石炭」相關的圖書內之篇章或期刊論文資料全部彙整出來（素木得一，1946，頁9-10）。以今日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檢索功能，或許對於該館的整理索引

功夫不覺特別，但是當時的學術機構能夠對八萬餘冊館藏從事鉅細靡遺地整理，實在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紮實工程。

被合併後成為「南方資料研究室」，則完成了《英國南洋殖民地資源文獻目錄》、《南洋史文獻目錄》、《臺灣文獻總目錄》、《熱帶亞熱帶農林害蟲文獻總目錄》（長官公署，1946，頁112），共四種館藏目錄。戰前該「南方資料館」位於圓山擁有獨棟館舍，戰後遷移至市區內北門街，與圖書館臨時館舍較近（劉滿子，1946，頁16）。

范壽康擔任臺灣省立圖書館館長職務僅一年（34年11月至35年10月），民國35年11月1日陳儀派長官公署參議吳克剛兼任館長職務，同年12月吳氏辭去參議一職（長官公署，1946），專任館長。從各種資料研判，范壽康對於臺灣省立圖書館的工作並不熱衷，也未積極投入戰後的圖書館復員工作，即使任職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兼圖書館館長兩項職務，也未籌畫應如何讓臺灣省立圖書館尋覓適合的地點，另籌蓋獨立館舍重新開館，將分散各地的圖書集中重新加以整頓，或任用訓練更多臺籍館員，進行館務的推動與發展。范壽康所關心者乃教育事業的推行，而非圖書館事業，在戰後復員的關鍵時刻，錯失接收重建的寶貴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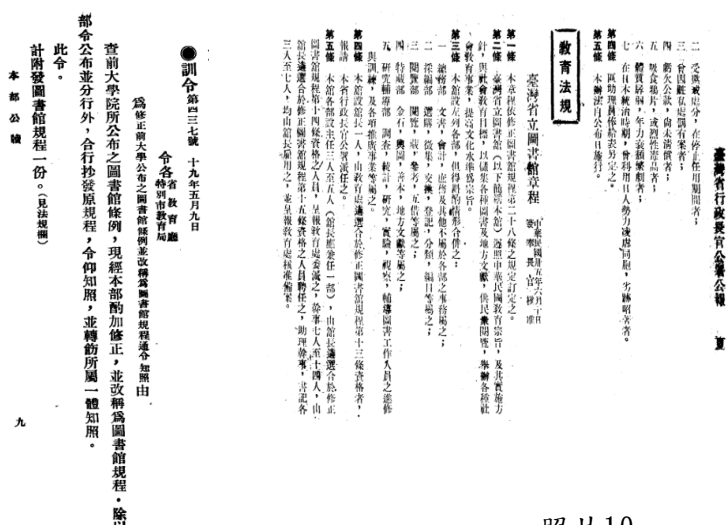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接收後，改制為臺灣省立圖書館，直隸長官公署，由范壽康接收，後范氏任教育處長，仍兼館長一職，因兼職眾多，乃將圖書館館務委託給山中樵全權處理。又因戰時破壞，圖書館暫遷博物館一樓充當臨時辦公室與閱覽室，僅運回少數圖書供流通閱覽，工作人員計有原總督府圖書館的日籍與臺籍館員，與新聘的員工，開始戰後臺灣的圖書館事業。

五、初期營運模式

國民政府尚未接收臺灣前，山中樵已經在原博物館暫借一樓作為臨時辦公室，維持正常的運作，進行圖書整理的工作（塩見俊二，2001，頁34-35），范壽康與山中樵正式辦理接收手續後，開始從事戰後臺灣省立圖書館的運作。

首先是設立組織架構，民國35年2月5日公布〈臺灣省立圖書館組織規程〉（長官公署公報，1946，頁34-35），共有十三條條文，其中第二條至第七條關於組織架構的規範，圖書館置館長一人，下設總務部、採編部、閱覽部與研究輔導部；各部置主任一人，幹事八至十二人、助理幹事八至十八人、書記三至五人、並得酌用雇員若干人。另設南方資料研究室，置主任一人，由館長兼任、研究員三人、幹事四至六人、助理幹事三至五人、書記雇員各四人。所有職員承館長之命，分掌各該部事務。另為謀圖書館事業之發展，得組織各種委員會。

此一架構運作不到四個月，因教育部認為長官公署制定的〈臺灣省圖書館組織規程〉內容，與教育部制頒的〈圖書館規程〉（教育部公報，1930，頁9、24-28）不符，另須根據〈圖書館規程〉重新制定。於是長官公署根據〈圖書館規程〉，重新擬訂〈臺灣省立圖書館章程〉，並於民國35年6月10日公布，增加三條條文，共計十七條（長官公署公報，1946，頁592）。



照片10

照片9 教育部頒〈圖書館規程〉

資料來源：《教育部公報》2:20（南京：教育部，1930年5月17日），頁9。

〈臺灣省立圖書館章程〉

資料來源：《臺灣省行政臺灣省臺灣省長官公署公報》35夏：37（臺北：臺灣省行政臺灣省臺灣省長官公署，1946年6月12日），頁592。

該〈章程〉是爾後歷次的修正版本最原始母法，因此必須詳細分析條文

內容。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明該章程，係根據教育部〈圖書館規程〉訂定；第二條闡述臺灣省立圖書館的功能與任務，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乃為儲集圖書與地方文獻，供民眾閱覽，舉辦各種社會教育事業，以提高文化水準。第三條關於組織架構，共設置五個部門，分別是總務部、採編部、閱覽部、特藏部與研究輔導部，但可以斟酌情形合併部門。第四條至第六條為人員的任用資格與員額配置，館長由長官公署派任；各部主任由館長遴選，呈教育處委派；幹事、助理幹事與雇員，由館長聘任或雇用，各部員額十至二十一人不等。第七條，圖書館應舉行館務會議與輔導會議，前者每月開會一次，為館長與主管會議；後者每半年開會一次，由館長召集主任與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代表，討論圖書館辦理輔導與推廣事業的興革。

第八條規範二種館內會議項目，一為工作討論會，一為經濟稽核委員會，皆屬於工作會報性質。第九條圖書館為謀圖書館事業發展，得組織各種委員會。第十條圖書館應每年編具事業發展計畫與年度預算，呈長官公署核備。第十一條與上條條文呼應，圖書館應於年底整理工作報告與經費結算呈長官公署。第十二條關於經費預算的比例分配，人事費不得高於50%，辦公費不得高於40%，圖書採購費不得低於40%，對於圖書採購提供基本的經費保障。第十二條規範職員薪俸，依據〈臺灣省社會教育機關服務人員任用及待遇規程〉。第十五至第十七條說明辦事細則另定之、未規範的部分則依教育部的〈規程〉辦理，並自公布日實施。

（一）人事與經費

該〈臺灣省立圖書館章程〉是民國35年6月10日公布，並立即實施，關於晉用人員的情形，查考當時接收後的人事配置，34年11月連同范壽康在內共23位館員，35年1月則多加三位，達26位館員。35年2月范壽康代理教育處處長，不再支領圖書館的薪俸，該月份的館員數增為33人。

但35年8月的館員人數，則遽增到41人，觀察該二次的增加人數，都與公布〈臺灣省圖書館組織規程〉和〈臺灣省立圖書館章程〉的時間點吻合，增加的人員均以技工與僱員為主，仔細觀察所列工作職掌，大部分為清潔打掃、環境整理、擦拭玻璃、館長傳達、開閉窗戶、值茶蓋印、看管宿舍等與圖書館專業無關的庶務性工作。至於這些工作人員的錄用，是否與館長范壽康有關，因無進一步資料可證實，目前不得而知，但是與民國36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前夕的許多臺灣社會現象，似乎頗為一致（賴澤涵，1994，頁175－178）。

41位館員中，分配的情形是總務部6人、採編部8人、閱覽部9人、研究輔導部6人、南方資料室12人，其中包括17位日籍留用人員（劉滿子，1946，頁17）。到民國35年11月范壽康與吳克剛兩位館長進行職務交接時，列在職員

交接名單中的員額有49位，比較8月份的員額又增加位，這八位分別納入採編部、總務部與研究輔導部，擔任主任與幹事的職務（圖書館移交清冊，1946），與前二次錄用雇員的情形不同，若與下一節《圖書月刊》的編輯內容進行比對，這次晉用的館員皆與圖書館的經營管理專業相關。

至於經費的部分，由於臺灣省立圖書館係獨立機關，因此可編列在長官公署一級單位年度預算中，從《臺灣省三十五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1946，頁21）與《臺灣省三十六年度地方歲入歲出總改算編制說明》（1947，頁31）分析，臺灣省立圖書館三十五年度的總預算為1,169,100元，另編有圖書臨時採購費150,000元，三十六年度則編列總經費4,580,520元，其中755,300元為圖書採購費，而人事費、設備費與業務費則為3,825,220元，從上列的預算數字，得知人事費仍是圖書館最主要的支出項目，三十六年度的圖書費亦僅佔總年度預算的16%，未達〈臺灣省立圖書館章程〉第十二條的圖書採購費40%標準；三十七年度的上半年，臺灣省立圖書館的總經費高達6,328,968元。但由於戰後物價波動異常嚴重，雖編列高額預算，但仍抵擋不住節節攀升的通貨膨脹，因此在各項條件均感匱乏的情況下，臺灣省立圖書館開啟戰後的館務工作（王潔宇，1965，頁12-13）。

（二）閱覽流通與巡迴文庫

在尚未正式開放閱覽前，《民報》的一篇社論（1946年3月16日，第1版）就撰寫一篇題為〈對圖書館界的希望〉的文章，該報一開頭就先恭賀臺灣省立圖書館已順利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且已正式公布〈臺灣省圖書館組織規程〉，圖書館即將展開新的業務工作；其次提到現代圖書館的功能絕非藏書庫，也不是「讀書子」們用功的地方，它是一國、一地方的文明象徵，圖書館發達與否與該國文化發達消長關係密切，值得政府與民眾共同關心。接著該報對臺灣省立圖書館提出三點期望，首先，期盼作為臺灣與各省文化交流的「河道」，圖書館應多購置各省的刊物與新出版的圖書，讓臺灣民眾透過書報雜誌多了解認識祖國；第二，圖書館應輔助學校教育之不足，由於學校的課本教授的內容有限，圖書館應廣泛蒐集各式參考書與必要的文獻，輔助學校有限的教材；最後，該報誠摯呼籲臺灣省立圖書館應積極蒐購臺灣的歷史、文化一切相關的圖書資料，作為研究臺灣的資料重鎮。

經過戰爭的摧殘與破壞，已經習慣利用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民眾，引頸期待政府重新開放圖書館，輿論也對接收改制後的省立圖書館賦予使命與願景。臺灣省立圖書館於民國35年4月1日與博物館同時開放（劉滿子，1946，頁16），該館最大的使命為「介紹祖國文化」（福，1946，頁8）。凡年滿十二歲以上市民皆可入館閱覽，開放時間為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休館日為每週一、每月月底、一月一日開國紀念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烈紀念日、

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十月十日國慶日、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初期僅開放館內閱覽，採閉架式管理，讀者須填具申請書向館員取書，每次可借閱三冊，但新書只限一冊；報紙則自行取閱不須填申請書。直到民國35年12月吳克剛館長上任後，才開放圖書外借服務，其辦法規定須年滿十二歲以上，且須取得具保並抵押保證金臺幣五百元，借書證有效期限為半年，每次可外借二冊，借期二週可續借一週，逾期還書者每冊每日罰款臺幣一元（臺灣省立圖書館，1946）。以上的辦法影響後來臺灣各地圖書館的運作方式，例如全臺灣各地圖書館多選擇週一為休館日，以及逾期還書大都選擇罰款作為處罰方式等。

由於借用博物館一樓充當圖書館，面積狹小不敷使用，幾乎所有可利用空間均充分規劃（王潔宇，1965，頁2-3），從《圖書月刊》（1947，頁1-2）所附的照片，得知兒童閱覽室與閱報室都設置在一樓東、西翼走廊，可說是因陋就簡，而全館的閱覽座位共五十席，在如此慘澹的條件下，開館第一年的進館人次為四月份34人、五月份71人、六月份80人；七月份98人、八月份195人、九月份182人、十月份197人、十一月份255人（長官公署施政報告，1947，頁112）。人數一直不斷持續上升，而會產生進館人次成長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是取消進館門票費用，35年4月1日開館後，原本進入該棟館舍，每人要收取五角的「看覽料」，自同年5月1日起改為免費（民報，1946年4月26日，第2版）；第二個原因為電力輸送穩定，且圖書館的電燈照明設備已裝修完竣，因此從該年7月16日起，晚上亦開放閱覽到九點（民報，1946年7月17日，第2版）；第三個因素乃自35年11月份起，星期一與例假日一律不休館，每日開放（民報，1946年11月16日，第2版）。

戰後百廢待舉，各項復員工作都在分頭進行，這段期間的臺灣省立圖書館雖然物資條件不佳，但仍有幾件工作項目值得讚揚。首先，35年10月公告（圖書月刊，1946），自該月開始試辦巡迴文庫，但是該館館藏的中文圖書不多，又因人手不足，無法派遣人員前往各地，故試辦二個文庫，第一個是國民學校文庫，第二個是中學文庫，前者挑選六百餘冊，後者四百餘冊，以臺北地區學校為主要的申請對象，到館申請後，即送書到學校，每校可借一星期，期限到時，圖書館人員則會同下一個巡迴學校的負責人，共同到已使用過的學校會合，進行點交圖書。這是在中文圖書仍不豐富的情況下，為了推廣而進行的工作，後來則擴大到北部縣市巡迴。從民國35年10月開始到12月底，臺灣省立圖書館總共實施巡迴文庫十二次，借閱圖書達1,061冊（長官公署施政報告，1947，頁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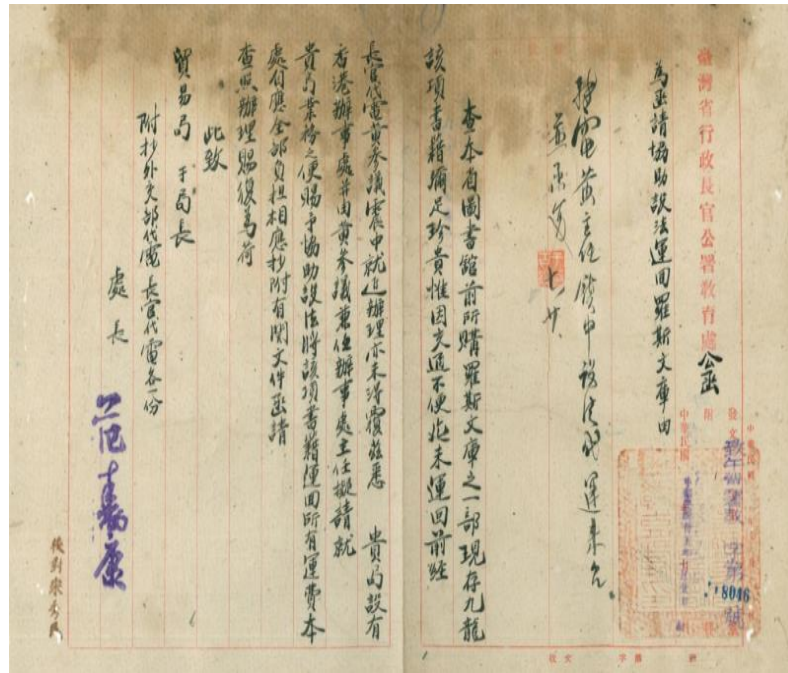
（三）採購圖書

為了能夠讓臺灣民眾「了解祖國文化」（劉滿子，1947，頁20），必須提供大量的中文圖書給讀者閱覽，臺灣省立圖書館持續進行蒐集圖書的業務，民國35年，編列大筆經費派人到上海購置中文圖書，第一批為四部叢刊、萬有文庫、圖書集成、二十五史、辭源、辭海等，約五千冊；第二批則採購中學生文庫、大學叢書、新出版圖書雜誌文藝等書籍，約一千五百餘冊（劉滿子，1947，頁17）。戰後臺灣受限於印刷設備與銷售量的關係，無法大量印製出版品（蔡盛琦，2011，頁82），所需中文圖書大部分仍依賴外地進口（黃得時，1981，頁4）；當時的上海是全國出版業的中心，臺灣所進口的中文圖書亦由上海運來（黃得時，1972，頁103）。到上海購書一事還被當成重大新聞，刊登在報紙上（臺灣新生報，1946年6月13日，第2版）。

此外還委託山中樵向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洽購圖書，總計約四萬餘冊圖書，經費臺幣297,812元（代辦買回元臺北大學教授藏書收支簿，1947）。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圖書館（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2012，頁12-13）的調查，內容以社會科學類占最大宗，是研究臺灣的寶貴學術資料。

期間還透過長官公署向英國香港當局，索取戰前臺灣總督府向義大利駐廣東領事羅斯（Giuseppe Ros, 1883-1948），⁷購買的私人藏書與民藝品，該批「羅斯文庫」僅運回一萬餘冊（郭芳明，2013，頁47-76）。除「羅斯文庫」外，廣東省政府（粵省府移贈臺灣省圖書館中文圖書，1947）贈送一批「魚鱗圖籍」，是研究土地經濟的第一手資料，獲得學者的青睞（劉金狗、黃得時，1972，頁101-102）。館方亦陸續採購圖書或獲得各界贈書，其中最大宗為日人伊藤的二千冊贈書，與各機關團體的贈書，或採交換方式獲得外文圖書（王潔宇，1965，頁20）。

⁷ 羅斯（Giuseppe Ros, 1883-1948），於1908年來中國，在上海、漢口、北京及廣州的意大利領事館工作三十年，羅斯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和廣東話，認識中文古籍，算得上是一位西方漢學家，1948年逝世於海南島海口。羅斯在華期間，悉心搜集漢籍書畫達七、八萬冊之多，收藏特點是藏品覆蓋的地域，大多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及湖南相交界的地區，有許多少數民族資料，這些圖文資料往往在官方刊印的書籍中不易見到。1925年由日本滿鐵株式會社收購六百多件地圖，其他的蒐藏已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全數採購，因戰爭無法立即全數運回臺灣，戰後被香港政府滯留。後來，1946-1950年期間「羅斯文庫」輾轉移送到華盛頓文獻中心（Washington Documentation Center, WDC），後來移轉到美國國會圖書館。詳見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美國國會圖書館授權本館製作（檢索日期2018/8/1）。



照片11 長官公署教育處擬請索回「羅斯文庫」公函

資料來源：〈教育處函臺灣省貿易局〉，收入《教育處函請貿易局協助運回羅斯文庫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1600009001，掃描號501800350003。

經過一年的持續採購，截至民國35年12月對臺灣省參議會進行工作報告時，該館採購圖書的統計如下（長官公署施政報告，1947，頁111）：

表2 民國35年12月臺灣省立圖書館進館館藏統計

種 類	冊 數	來 源
中文圖書	10,000冊	採購、贈送 1. 上海大宗採購為主 2. 零星採購 3. 各機關或個人贈書
日文書	40,000冊	採購 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藏書
伊藤贈書	2,000冊	贈送

拓殖株式 會社藏書	12,596種	接收
小計	12,596種 52,000冊	
報紙	28種	採購、贈送
雜誌	110種	採購、贈送
小計	138種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長官公署編，

《長官公署施政報告》，頁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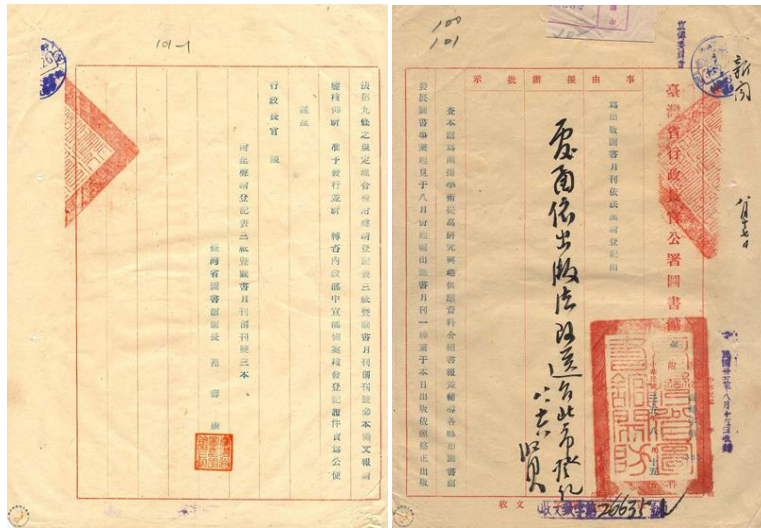
圖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另一項重要的變革是分類法的改變，原總督府圖書館的分類法採「和漢圖書分類法」，雖然亦為「十進分類法」的邏輯架構，但其分類體系則以該館日文圖籍的分類依據，具有歷史上的特殊意義（林慶弧，2010，頁178），但並不適合中文圖書的分類體系，因此面對新的制度變革，最大的改變也是最艱鉅的任務，就是實施新的分類法。臺灣省立圖書館決定採取「皮高品氏」的分類法，新採購的中文圖書則率先採用，而館藏舊籍則挑選中文圖書，一本一本重新加以分類。到該年底已進行重新分類編目的圖書，中文計六千冊，日文計四千冊（長官公署施政報告，1947，頁111）。但因為該分類法過於簡單，到民國44年12月又改採金陵大學圖書館編印的「中國圖書分類法」，西文圖書亦一併改用「杜威十進分類法」，進行館務大改革（王潔宇，1965，頁16-23）。

（四）出版《圖書月刊》

戰後臺灣圖書館史上，第一種圖書館的專業期刊在民國35年8月就已出刊，無論從圖書館學的立場，或是以當時的社會動盪、經濟衰退、通貨膨脹與物資欠缺，以及出版品必須登記並接受審查的情況下（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頁28-29），能夠出版以圖書館學術發展、經營管理、調查研究為主軸的專業性期刊，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大事。

《圖書月刊》創刊號於民國35年8月15日發行，館長范壽康為發行人（本省新出刊物登記，1946），黃德福與劉滿子擔任編輯人，採月刊形式，每期定價臺幣六元，半年六期定價三十六元，全年則優待價七十元。范壽康（1946，頁1）的〈創刊辭〉說明該刊物承載著三大任務：1.重建祖國固有文化；2.提升臺灣文化水準；3.溝通內地學術與文化消息。創刊號雖然只有二十二頁

，但在當時臺灣出版的中文雜誌缺乏的窘境情況下，《圖書月刊》的讀者群卻是非常眾多，甚至來函反映意見，期盼《圖書月刊》增加篇幅以饗讀者，但是《圖書月刊》編輯部表示因月刊出版性質所限，僅刊登學術文章與圖書館相關議題，因此稿源缺乏，無法擴大篇幅請讀者見諒，並公開徵求學術性文章。



照片11 臺灣省立圖書館申請出版《圖書月刊》公函

資料來源：《圖書月刊應依法辦理申請登記手續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13710015040，掃描號224300350112至224300350120。

《圖書月刊》第一卷從35年8月的第一期開始，前四期每期印刷一千冊（長官公署施政報告，1946，頁112），到該年十二月止，共出刊五期。然而，到36年的第二卷開始，就因印刷用紙缺乏、物價波動，與印刷工廠的罷工事業等，而造成刊物的延遲出版，《圖書月刊》即為此而遲刊多次，從〈編輯室談話〉（1947，頁4）中為延誤出版的致歉說明可一窺其因。戰後大環境的物價波動，連帶也影響到《圖書月刊》的出版，當年不但紙張漲價，油墨、工資、運費都漲一倍至數倍之多（臺灣新生報，1946年7月1日，第2版）；蕭聖雄（1992，頁90）調查民國36年時，又因造紙的毛毯及銅絲網缺乏，以致造紙業產量不足，面臨紙張缺乏的窘境，因此第二卷出現第一期與第二期、第三期與第四期、第十一期與第十二期合刊的情形，最後的第十一期與第十二期合刊，竟也成為《圖書月刊》停刊的最後一期。

然而綜觀《圖書月刊》的各期內容，卻可以發現該刊物不愧是戰後的第一種圖書館專業期刊，而且也記錄戰後臺灣圖書館史發展的重要史料，雖然僅有短短二年，總共才十四本期刊，但就《圖書月刊》的內容而言，第一卷第一期就有四篇與圖書館主題相關者，首先是素木得一（1946，頁9-10）的

〈所望于圖書館者〉，介紹學術性期刊論文索引製作的重要性，其所說明的內容與服務方式，實與今日圖書館界所提倡的「SDI」（SDI,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中文翻為「專題選粹服務」）⁸服務一致，實在是領先的服務觀念。

因臺灣省立圖書館擁有當時全臺灣的出版品，如新聞報紙、期刊雜誌、圖書等，因此館員黃德福（1946，頁14-15）的〈臺灣出版物鳥瞰〉，就是了解戰後的第一手寶貴資料，該文介紹戰後臺灣當時的出版情形，可知民國35年有日刊十一種、三日刊三種、五日刊二種、週刊和旬刊各一種，發行量最大的是臺北的《臺灣新生報》和臺南的《中華日報》，站在民間立場、為民眾發聲的報紙則有《民報》與《人民導報》二種，內容生動活潑，報導八卦的則為《大明報晚刊》；此外當時的雜誌，出版七種週刊、三種旬刊、四種半月刊、五種月刊和二種畫報，大部分是綜合性的刊物，該文也分析當時臺灣整體的出版品情形。

而劉滿子（1946，頁16-18）所撰寫的〈本館成立經過及概況〉，則是臺灣省立圖書館接收改制後的第一篇館史，對於了解該館的接收過程，與當時的經營管理，服務的各種細節，是研究該館的重要史料。馬濟美（1946，頁11）的〈顯微攝影與圖書館事業〉一文則由二次大戰期間，為蒐集情報任務而發展出來的間諜型攝影技術，衍伸出美國圖書館已開始利用該技術做為大型圖書館的典藏工具，雖然臺灣目前仍無此必要，但仍可了解圖書館的未來趨勢，該文在戰後發表，可能無法引起關注，但卻代表圖書館員的專業研究精神，走在時代前端。

作為臺灣省立圖書館的機關刊物而言，「為闡揚學術、提高研究興趣、供應資料、介紹書報，並輔導各縣市圖書館發展圖書事業起見」，係《圖書月刊》最重要的宗旨與實踐，由於《圖書月刊》所刊載的文章，對於圖書館事業的經營與啟發，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該刊發行期間，它一直本著既定目標，充分發揮其作為戰後的第一種圖書館專業期刊的功能。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明確發現《圖書月刊》以傳播圖書館專業工作新知，與實務工作經驗交流為主，其中以任職於臺灣省立圖書館館員投稿較多，外稿的來源較少，但其中有一篇〈怎樣利用圖書館〉（顧家杰，1947，頁1-3），是遠從雲南昆明寄來的稿件，表示該刊物的讀者群並不只限於臺灣島內。⁹除上列的專業性質的文章外，每期的《圖書月刊》（1946-1947）也都輯錄該館新到的中文圖書與西文圖書的目錄，因為全部照錄造成篇幅龐大，甚至

⁸專題選粹服務（SDI）又稱為資訊選擇傳播服務、專題資訊服務，是針對讀者的個別需求，選擇最新資訊，以主動積極的方式，定期提供服務，其目的在於節省讀者檢索資料的時間，協助讀者獲取更多相關資料，並加強館藏的流通和使用。詳見曾淑賢，〈專題選粹服務〉，收入胡述兆總編輯《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5年），頁1371-1372。

⁹作者是昆明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該文主要介紹現代圖書館的重要性，教導讀者利用圖書館的技巧，文末作者還表示不收稿酬。

被讀者來信反映，希望減少該部分的刊登，亦有幾期介紹館藏新書的書評，但只維持三期即告停止，未再延續；而任職於採編組幹事的馬濟美，翻譯美國圖書館學家McCollough、Buren與Stearns（1931），三位合著的*Essentials in Library Administration*一書，雖然距民國36年已是十六年前的版本，但在當時卻是非常新穎且少見的圖書館工作指南，最可貴的是，從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開始連載，直到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結束，總共分八次將該書全數翻譯完成，對於提供戰後臺灣圖書館經營管理的參考，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

陳儀（民報，1936年10月9日，第3版）在一次長官公署的首長會議中，指示臺灣省立圖書館要多購置中文圖書，充實館藏提供給公務人員進修，並出版目錄供檢索，此外還要了解全臺各地圖書館的經營情形，並將各地圖書館的館藏目錄集中在省立圖書館，並負起輔導各地圖書館的責任。這是首次見諸報端，陳儀針對圖書館的經營所發表的談話指示，但觀諸內容，僅提到要多加充實館藏，並沒有針對圖書館的館舍建築有任何的意見。

而原本的臺灣省立圖書館在長官公署時期，行政位階直隸長官公署管轄，與教育處平行，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為緩和臺灣民眾的積怨（鄭梓，1994，頁248），俯順臺灣各界要求省制變革，終於在民國36年4月12日下令「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同日任命魏道明為臺灣省政府委員兼主席。

進入省政府時代，原直接隸屬長官公署的臺灣省立圖書館，在民國36年8月修改組織規程降低隸屬層級，改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臺灣省圖書館組織規程修正討論事項，1947），民國37年3月並更改館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省圖書館博物館改隸教育廳監交人選令派案，1948）。



照片 12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改隸公文

資料來源：〈省立圖書館、博物館改隸教育廳，茲經令派會計長王肇嘉前往監交，除分令外，仰即知照〉，收入《省圖書館博物館改隸教育廳監文人選令派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省政府檔案，典藏號 0000007534，掃描號 0000072601。

這件文化機關省立臺灣圖書館降格改隸事件，被楊雲萍（1947，頁 65）譏諷魏道明對於文化事業的不重視，省當局將省立編譯館撤銷之後，又要將省立圖書館和博物館縮小，改屬教育廳。

聽說魏道明先生以下的省政府當道諸公，多是學者，是以「學者從政」的。可是，這些「學者」對於學術機關的見解，是如此。這有使我們知道世上的「見解」也者，果有種種。

然而，在民國 38 年戒嚴令頒布後，政府實施「反共復國」的文教體制，圖書館的發展更是受到嚴峻的挑戰，圖書館更加喪失對於社會教育與文化發展的主導性，一切以國家政策與施政目標為導向，成為配合國家政策的社教機關。

六、結語

戰後初期對臺灣而言，所經歷的文化變遷，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殖民結束，國民政府統治臺灣，是臺灣近代史至為關鍵的政權轉移、政制變革與制度的交接。

范壽康負責接收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同時，實際上也一併接收「南方資料館」，改制為臺灣省立圖書館，直屬長官公署。接收後，最困難之處在於沒有館舍可以利用，暫借博物館的一樓空間辦公與服務，該館初期留用日籍

館員為主力，開始戰後臺灣的圖書館事業。

該館在各項條件均感匱乏的情況下，仍勉力維持館務運作，特別編列大筆經費派人到上海購置中文圖書，以暫時舒緩中文圖書不足的窘境。此外，亦向臺北帝國大學日籍教授洽購圖書，期間還透過長官公署向英國香港當局交涉索回「羅斯文庫」，亦陸續採購圖書或獲得各界贈書。

此外，為配合禁用日文書籍政策，趁此機會將所有館藏中文圖書，由原來的「和漢圖書分類法」全部改用「中國圖書分類法」進行分類，此一工程可為浩大，也奠定後來持續運作服務的重要基礎。雖然無空間可茲存放大量中文圖書供應閱覽，臺灣省立圖書館改採巡迴書庫的方式進行服務，提供給北部各縣市的學校與公家單位借閱，可說是解決空間與擴大服務的兩全其美模式。

最值得稱道的則是，在物力維艱的背景下，仍然勉力出版戰後臺灣第一種的專業圖書館刊物—《圖書月刊》，雖然只有短暫兩年 14 期的刊物，但是觀察文章內容的水準與方向，均為當時的最新資訊，和學術性質的文章，《圖書月刊》所刊載的文章，對於圖書館事業的經營與啟發，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該刊發行期間，它一直本著既定目標，充分發揮其作為戰後的第一種圖書館專業期刊的功能，是難得可貴的作為。

該館於民國 37 年 3 月更改館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並改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仍棲身博物館一樓勉強繼續經營，唯空間不足與館藏未能充分發揮，導致閱覽服務的功能大受影響，未能開展臺灣省立圖書館的閱覽體系與輔導職能。

戰後，臺灣的經濟蕭條，政府的財政縮減，通貨膨脹的問題嚴重。政府無法分出太多力量從事臺灣圖書館的重建，圖書館的發展並非當時政府的首要施政項目，反而是最不受到政府重視的時期，從目前各種已公開的文獻檔案顯示，缺乏對館舍建築、經費來源、館員補充與組織隸屬等問題，進行全盤性的考量與規劃，圖書館面臨各種無法開館營運的困境。

總括而言，戰後初期臺灣政治與經濟因素，兼以復員工作百廢待舉，侈言圖書館事業之重建與重視，因此臺灣省立圖書館改制後，首先面臨館藏、人員、經費與館舍等問題，戰後該館的發展並未受到政府的積極重視，圖書館的首要任務乃為配合推行「祖國化」，徹底執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政策，就目前檔案所見，這段期間的臺灣省立圖書館營運，是最無特殊建樹的時期。

參考書目

一、基本史料 國史館編

- 1990 《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上）》。臺北：國史館。
- 1996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一）》。臺北：國史館。

- 1996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二）》。臺北：國史館。
- 1997 《中華民國文化志（初稿）》。臺北：國史館。
- 1999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臺北：國史館。

國民政府

- 1934-1945 《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

許雪姬總策畫

-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1966 《臺灣省政資料輯要·第一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95 《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秘書室編

- 1946 《臺灣省日僑管理法令輯要》。臺北：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秘書室。

臺灣省立圖書館

- 1945 《山范交接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1945-1947 《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

- 1946 《臺灣一年來之宣傳》。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 1946 《臺灣一年來之教育》。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 1946 《臺灣省行政工作概覽》。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 1946 《陳長官治臺言論集》。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室編

- 1946 《臺灣民政》。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室。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

- 1946 〈臺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 1946 《臺灣省第一次教育行政會議實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

- 1945 《臺灣省三十五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 1946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 1946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作計畫》。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委員會編

- 1946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總報告書》。臺北：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法制委員會編

- 1946 《臺灣省單行法令彙編》。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法制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 1918-1942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一覽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 1933 《圖書館新築理由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二、專書與論文集

張圍東

1998 《山中樵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5 《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臺北：古籍出版社。

黃俊傑

2006 《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英哲

2007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文化公司。

2010 《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楊雲萍

2011 《楊雲萍全集·文學之部（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塩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譯

2001 《秘錄·終戰前後的臺灣》。臺北：文英堂出版社。

廖又生

2005 《臺灣圖書館經營史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鄭梓

1994 《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北：新化圖書公司。

賴澤涵等

1994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三、期刊（學報）論文

王潔宇

1965.9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史〉，《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刊》2，頁1-64。

王麗蕉、黃燕秋、李依陵

2012.6 〈臺灣現存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概況及其數位典藏發展〉，《國家圖書館館刊》101:1，頁4-17。

不著撰人

1946.4.26 〈圖書館閱覽改正免費〉，《民報》，第二版。

1946.6.13 〈省立圖書館籌購〉，《臺灣新生報》，第二版。

1946.7.17 〈省圖書館昨起延長開放時間〉，《民報》，第二版。

1946.11.16 〈博物、圖書館例假仍開放〉，《民報》，第二版。

社論

1946.3.16 〈對圖書館界的希望〉，《民報》，第一版。

林慶弧

2010.9 〈《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圖書館」專章纂修的比較〉，《臺灣文獻》61：3，頁20-39。

2016.4 〈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勘》17-18，

頁25-66。

范壽康

1946.8 〈創刊辭〉，《圖書月刊》1：1，頁1。

1946.12 〈關於臺灣省圖書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20：1-3，頁646-647。

素木得一

1946.8 〈所望于圖書館者〉，《圖書月刊》1：1，頁9-11。

馬濟美

1946.8 〈顯微攝影與圖書館事業〉，《圖書月刊》1：1，頁11-12。

郭明芳

2013.10 〈「羅斯文庫」廣州舊藏流散考述〉，《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集刊》2，頁47-76。

黃得時

1981.7 〈臺灣光復前前後後〉，《書和人》419，頁2-4。

福

1946.8 〈臺灣出版物鳥瞰〉，《圖書月刊》1：1，頁14-15。

1946.9 〈本館試辦巡迴文庫緣〉，《圖書月刊》1：2，頁8。

1946.10 〈臺灣省各縣市圖書館近貌〉，《圖書月刊》1：3，頁20。

劉金狗、黃得時

1972.6 〈臺北圖書館滄桑談〉，《圖書館學刊》2，頁98-105。

劉滿子

1946.8 〈本館成立經過及概況〉，《圖書月刊》1：1，頁16-17。

蔡盛琦

2011.12 〈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語國語讀本〉，《國家圖書館館刊》100：2，頁63-91。

蕭聖雄

1992 〈臺灣二二八事件的經濟和文化背景〉，收入《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美文化交流基金會，頁90-102。

魏建功

1947 〈魏建功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II-120。原檔案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

顧家杰

1947.7 〈怎樣利用圖書館〉，《圖書月刊》2：7，頁1-3。

四、學位論文

郭冠霖

2001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藏政策分析〉。臺北：輔仁大學圖書館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

五、網路資料

國立臺灣圖書館/首頁/關於本館/歷史沿革

<http://www.ntl.edu.tw/ct.asp?xItem=836&CtNode=313&mp=1>（檢索日期
2018/8/1）

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羅斯文庫- 美國國會圖書館授權本館製作

<http://www.ncl.edu.tw/fp.asp?xItem=12515&ctNode=1251&mp=2>（檢索日期
2018/8/1）